

← (上接11版)

公民权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何关系?如何解释同时存在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这两套建城神话,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调和,其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在比尔德看来,后世罗马人一直不断地在试图“还原”(recover)、“改写”(rewrite)和“重现”(replay)其祖先和起源的历史,带着自己所处时代政治和文化上的焦虑、争议、观念与偏好。在此意义上,这种对早期历史的重建(reconstruction)是极富价值的。在这些建城传说和神话的背后,是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是罗马人之所以称为罗马人的一些特性与核心价值观,是他们继承自祖先的一切优点和弱点。罗马人将共和晚期对五方杂处、多元异质和内部冲突的感知投射到了他们的早期历史当中。从这一角度出发,无论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千里迢迢一路跋涉到意大利重建家园,还是罗慕路斯收容逃犯、流亡者和异邦人,又或者抢劫萨宾妇女以繁衍人口,都变得没那么难以理解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历史建构,罗马人将现实世界的“外来”、“流动”、“混杂”与“多样性”合理化。如果说罗

马人的祖先就是一帮流民和外来者,那么现实中罗马人慷慨地授予外族和奴隶以公民权,还有什么问题呢?尽管这种出身和起源经常成为希腊作家讥嘲、甚至罗马作家(例如西塞罗)自嘲的对象,公民权政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偶尔也会受到顽固派元老的质疑和阻挠,甚至爆发过像同盟战争那样的大冲突,但总的开放性进程并没有被打断。最为关键的,罗马人对它的合理性信念根深蒂固。我们只要想想克劳狄皇帝在公元48年说服元老接受外高卢人进入元老院的演说中将罗马人接纳外来者的传统一直上溯至罗慕路斯,这一点便可了然无疑。

既然对从早期定居点和墓葬的考古发掘来看,所谓王政时期的罗马更像一个部落国家和由军事贵族集团所主宰的世界。到了相当于王政晚期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罗马才发展出一种有城市中心与若干神庙及公共建筑的城邦形态。早期罗马平平无奇,论城市化和繁荣富裕程度比不上北方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市,更不用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激变发生了:罗马人的战争规模急速膨胀,胜利转化成了征服,其扩张脚步席卷了整个意大利。比尔德将此现象称为

“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第四章的标题)。那么这一激变是如何产生,罗马究竟是凭借什么脱颖而出的?这是第四和第五章(“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比尔德并没有大而化之地去谈论它,她还是遵循其一贯的提出问题、检讨成说、稽考证据、验证假设的论证思路。

罗马帝国的崛起是否真如波里比阿所说是由共和政体内在的均衡稳定性与职官贵族的荣誉竞争精神所带来的?应当说,罗马内部政治变革与外部军事扩张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为学者们的一个普遍共识。公元前4世纪中叶经历了“平贵冲突”后取代旧氏族贵族的新型“事功贵族”阶层(meritocracy)及其所造就的一种荣誉竞争文化固然构成了扩张的强大内在动力,但变革后所形成的并非是像波里比阿套用希腊政治思想所界定的那种“混合政体”(所谓执政官、元老院和民众大会分别代表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元素)。

在阐述该问题的同时,比尔德顺便回应了有关罗马共和国民性的争论。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被认为是波里比阿在当代最积极的响应者(他的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的小标题便是“波里比阿是对是错?”,他给出的答案自然是

肯定的),也是他重新挑起了近年来学界有关罗马“民众主权”的激烈争论。同波里比阿一样,米拉显然过分强调了民众的“形式主权”,这种针对传统“寡头制”理论的矫枉过正遭到了包括诺斯(John North)、莫瑞特森(Henrik Mouritsen)以及摩尔施泰因-马科斯(Robert Morstein-Marx)在内的大批学者的质疑和反驳。比尔德在这场论战中,站到了多数学者的一边。罗马共和政体的三大支柱成分显然是不均衡的。关键点在于,举凡选举、立法、司法,政治上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民众手中。撇开其他,首先财产就是官职竞选的先决条件。不过,比尔德也公正地指出,米拉对于“罗马民主”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以往被忽视的制度以外的更广阔的政治文化层面,职官贵族无论是想要成功当选,还是通过法案,都需赢得民众的选票和认同,讨好民众和说服术于是成了制胜关键。罗马的寡头政体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公开与公共的氛围里运作的,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紧张依存关系。

然而在比尔德看来,与内部政治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扩张动力来自罗马吸纳战败者、将后者的人力、武装和资

源转为己用的超凡能力。这一点在公元前4世纪初罗马对邻近维伊人(Veii)的征服中已初露端倪,此后,这一将战败者变成罗马公民(或者说“准公民”,最开始大多数的意大利城邦都被授予了拉丁公民权)、将昔日的敌人转化为盟友的模式在对意大利半岛、继而在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中被一再复制。

过去,人们往往将罗马公民权的扩大看作是帝国扩张的结果而非动因,比尔德则彻底更新了我们对于罗马公民权的认识。她在文中反复强调,公民权的扩大和分享才是罗马势不可挡的真正秘诀。罗马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改变了古代世界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他们不再单纯地以攻城略地、抢夺物资人口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长久的对己有利的同盟关系。因此,罗马人施加于被征服者身上的长期义务往往是提供兵员补给,而甚少派驻常备军与实施直接统治(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种将被征服者同化为征服者、分享扩张利益的机制赋予了帝国事业以一种强大的动力、支撑与后盾。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古代帝国都

(下转13版) →

## 中国发现新的古老型人类“许昌人”

徐文堪

2017年3月3日,《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许昌发现的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头骨》(Late Pleistocene archaic human crania from Xuchang, China)的论文。该文献称,在中国许昌发现了生活在10.5万年至12.5万年之前的“许昌人”,这是一种新的古老类型人类。其头骨形态无法归于任何一个已知的古老型人类类型,但同时具有北京人、尼安德特人,甚至现代人的某些特征。

中国古人类学家在近十年中开展了大量野外调查、发掘和化石研究工作,先后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湖南道县福岩洞、安徽东至华龙洞等地发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从而对中国更新世中、晚期人类演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发现“许昌人”的灵井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2007年和2014年两次出土人类头骨化石,这些发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

现之一,遗址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发现的头骨碎片代表5个个体,其中1号和2号个体相对比较完整。“许昌1号”头骨由26块游离的碎片组成,复原后的头骨保留有脑颅的大部分及部分底部,代表一个年轻的男性个体;“许昌2号”头骨由16块游离的碎片拼接而成,复原后的头骨保存有脑颅的后部,为一较为年轻的成年个体。

最为奇特的是,“许昌人”头骨上发现了两个性状与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相似:一个性状表现在顶区,包括不发达的枕圆枕、不明显的枕外隆突伴随其上面的凹陷;另一个性状是内耳迷路模式,前后半规管相对较小,外半规管相对于后半规管的位置较为靠上。这说明两个人群之间可能有过基因交流。有学者推测,“许昌人”可能代表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

先。还有学者推测:在“许昌人”之前,东亚大陆气候寒冷,“许昌人”的先辈向气候温和的欧洲迁移,与早期尼安德特人相遇并杂交。后来气候转暖,这批古人类重返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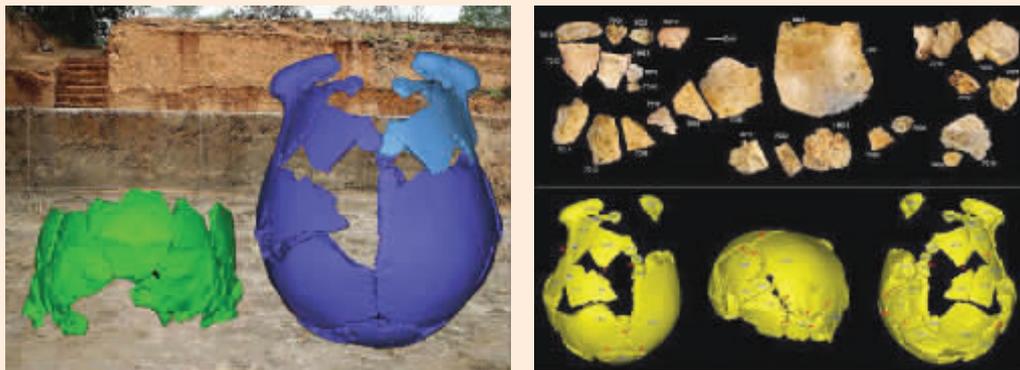
参与这一项目并在刊发论文上署名的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占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秀杰、刘武、高星,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周力平,

华东师大河口海岸实验室年小美,美国科学院院士、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特林考斯(Erik Trinkaus)。

《科学》杂志在刊登论文的同时,附载通讯记者吉本斯(Ann Gibbons)的简评。简评引用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著名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的话:大家还是会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关系密切。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玛利亚·马蒂农-托雷斯(Maria Martinón-Torres)女士也有类似看法。尽管新发现的头骨身份尚未完全确定,但她仍表示兴奋:“中国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

“许昌人”研究最为可惜的是没有提取到DNA进行检测,所以目前种种推测仍只是猜想,还须要进一步的研究予以证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左:河南灵井遗址发现的许昌人1号(右侧)和2号(左侧)头骨化石。右:许昌1号头骨化石碎片及其3D虚拟复原。(均吴秀杰提供)